

# 重新认识资本的生产性作用

## ——对第二代美国学派经济发展理论的评述

贾根良/杨威 Jia Genlia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Yang Wei,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Economics,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英文标题】**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ductive Role of Capital: A Commentary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American School

**【作者简介】**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19世纪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通过对资本生产性作用的重新认识，建立了一套后发国家的经济独立与发展学说，从而指导美国成功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崛起。该学说强调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业化国家的国际贸易优势来自于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而非相对禀赋，以及保护主义政策有利于建立阶级间和产业间利益协调发展的国内统一市场。本文对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指出了它对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借鉴意义。

The second-generation scholars of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School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developed a system about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ductive role of capital to guide America's successful industrialization. The doctrine emphasizes that the powe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ems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while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dvantag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mes from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other than the relative endowments, and the protectionist policie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domestic markets which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lass and inter-industry interest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core content of this theory and points out that it has a major reference for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关键词】** 第二代美国学派/资本的生产性作用/工农业发展战略 the Second-generation America school/Productive Role of Capital/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一、概述

翻开美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1814年英美战争结束至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的80多年时间中，依靠不断进步的科技发明与应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的政府政策、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极大改善的交通运输条件，美国成功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崛起。然而，在18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英国曾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着工业霸权并实行了广泛的制造业垄断，其政治经济学家也基于比较优势学说对美国应放弃工业、专经农业并与英国开展自由贸易进行了充分论证。美国工业化进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和进行的，美国学派学者也对英国自由贸易学说进行了坚决的驳斥。这里所说的美国学派，是指从18世

纪末至 19 世纪末，由实践其学说的政治家以及为该学说提供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所阐发并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

在这些美国学者看来，英国经济理论与美国社会现实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如英国理论假设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而自然资源的供给会日趋减少，但美国却呈现出人口增加与工人工资提高相互促进的状态；古典理论认为土地报酬递减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规律，而美国此时拥有大量未开发土地，而且先进农具的引入又使其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英国理论指出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存在尖锐的对立，而美国则表现出社会地位变动灵活开放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 年）为开始标志，早期的美国学派采用以归纳为特征的历史分析方法，强调美国社会经济条件代表了英国理论的例外，美国应以各种方式促进其制造业的发展，其成果就是以保护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为核心内容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政策体系，它由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于 1824 年正式提出。第二代美国学派学者则把之前零碎繁杂的保护主义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统一的经济独立与发展理论，他们借鉴了抽象演绎方法但试图使其分析与英国理论相比更具现实性、动态性，并以技术进步为基础。这种理论以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为代表，它强调以资本积累为途径的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探索在均衡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报酬递增的可能性与所需条件，并为捍卫美国的工业促进战略和关税保护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该学说在 19 世纪后半叶一直支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在指导美国工业化和经济崛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①</sup>因此，本文尝试对其核心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掌握这把开启美国经济崛起秘诀的钥匙，并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以凯里的研究作为开始，他根据农业种植发展史和美国化学家提出的土壤肥力理论，推翻了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同时还建立起一种以再生产成本为标准的价值理论，用以剖析和批判古典的价值与工资理论。凯里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帕申·史密斯，后者最终建立了一种以资本的能量生产率为核心的全新理论体系，从而重新解释了社会财富的再生产。然而，理论的发展顺序并不等同于其逻辑结构，通过分析和整理，我们认为上述学说的基本逻辑结构如下：该理论以资本的能量理论为核心，再生产成本价值论是其前提，高工资生产率理论与农业肥力生产率理论是其直接扩展；应用于政策层面，则产生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国内市场理论和后发国家发展所依托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学说。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主体部分仅就该学说核心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

## 二、再生产成本价值论与利益和谐论

在美国学派的学者中，亨利·凯里最早也最为全面地对商品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分析，他特别强调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对商品价值的重要影响。

针对价值创造的问题，凯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多种要素投入生产，决定价值的是商品的再生产成本——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新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估算，另一部分则源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价值转移，它虽然由过去劳动（或物化劳动）所创造，但却由再生产这部分资本的成本来决定。凯里强调，除了转移价值，资本在生产中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不断改进劳动质量，从而减少生产单位商品和补偿资本损耗的劳动数量。随着资本作用的发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将不断下降，这是因为其中劳动的再生产成本部分随着劳动数量的下降而不断减少，资本的转移价值部分也随着其再生产费用的下降而不断减少；然而，在劳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劳动质量的显著提高依然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从而使得产品的数量大大增加。因此，以人的劳动数量来度量的商品价值不断下降，以商品数量来度量的人的劳动价值不断上升，凯里由此得出了技术进步导致“物的价值下降，而人的价值提高”的

重要论断。

我们发现，凯里的再生产成本价值论虽然背离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以萨伊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要素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本质上旨在从分配角度为资本和土地获得租金的权利提供辩护；而凯里则将其分析重点放在了生产层面，即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在当时的美国，工人利用相同甚至更少数量的劳动可以创造出更多商品，凯里被技术提高对工人生产力的巨大影响所震撼。虽然凯里默认了商品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的事实，但其价值论强调的是，以资本增加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质量和减少各要素补偿费用方面的推动作用。

在价值分配方面，凯里根据上述论断得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谐论”：质量逐渐提高的劳动可以在对单位商品的分配中保持一个不断增长的比例，因此工人对生产成果的分配无论从比例还是从绝对数量来讲都会增加，而资本家虽然从单位商品中获得的比例在减少，但他获得的商品绝对数量仍会不断增加，因此，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协调的，双方都可以从资本积累过程中获得好处。<sup>②</sup>该理论是凯里在考察美国特殊的经济条件并与欧洲各国实际状况进行比较之后，再融入其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乐观希望得出的结论。然而，利益和谐的景象在 19 世纪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始终未能出现。究其原因，凯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看到了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的瓦解作用的肯定方面”，<sup>③</sup>并从直觉上认为各阶级的对抗关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被缓和，但他忽视了实现这种和谐必要的历史条件限制以及重要的政策背景，即国家对各阶级利益分配的合理干预。孟捷教授曾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分析了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正和关系存在的可能性。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利益和谐并非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理论，其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剩余创造问题合理分析的某种萌芽。孟捷教授论证了暗默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存在可以派生出工人分享剩余的权利，而技术进步可能会提高而非削弱劳动的复杂性，因此无论是个别先进企业或产业，还是世界市场中的某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使资本家与工人在经济利益上获得正和关系。<sup>④</sup>而凯里的利益和谐论以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为前提，强调劳动质量也就是工人的技能和知识通过培训或干中学不断提高，指出了劳动剩余索取权随着资本再生产价值的下降而不断增强，这些都符合孟捷教授指出的劳动与资本正和关系存在的条件。

帕申·史密斯也曾指出，资本增加可以降低生产过程中劳动的耗费成本，技术进步的必要性正在于将工人劳动从简单劳动提升到复杂劳动。基于上述理论，美国学派的学者进而论证了资本在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阐明了由能量所测量的资本生产率学说。

### 三、资本能量理论与生产要素交叉竞争理论

与英国古典理论认为资源是稀缺的这一悲观论调不同，在美国学派看来，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是潜在无限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人类对自然能量控制能力的日益增强。根据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史密斯提出了“物质与力量无穷循环规律”（Law of Endless Circulation in Matter and Force），认为财富的再生产可以被视为自然界能量总体均衡中包含的一个大型能量转化系统。于是，唯一的问题在于，人类应当采用怎样的手段来开发和获得自然财富？史密斯将资本视为激发自然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为了使社会能量剩余不断增加，人们应当通过技术更先进的生产性资本开发自然。从资本及其生产力的演进过程来看，在原始社会，人力是生产性能量的主要来源，只有随着能量密集型资本——如水车、蒸汽机等能量转化设备——逐渐积累起来，潜在于自然界的能量才会补充人类的手工劳动。这种能量“依靠机械装置的使用无偿为人类提供帮助，并为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资本最初仅被用于补充体力劳动，但后来则逐渐成为生产的主角；同时，劳动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劳动者从原先仅仅从事体力劳动，将食物转化为干活的能量，转变成为掌握技术的工程师，在劳

动中使用各种工艺来操作工业资本。在衡量社会产出方面，史密斯也发展出了一套测度能量开发水平的指标来计算经济剩余，即工业能量产出（也就是资本的生产率水平）与人类劳动耗费（即由再生产成本决定的商品和资本价值）的比值才是揭示社会财富生产力的关键，经济增长取决于这一比值人均水平的提高。<sup>⑤</sup>

史密斯对资本的分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一方面，古典或新古典学者普遍将资本视为物化劳动的表现形式，是价值理论的附属物，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理由或者工具，他们关于资本所列举的事例并未说明资本可以产生能量并替代劳动，而仅仅认为它是辅助劳动的简单工具——根据这种观点，手工织布机与蒸汽织布机是同质的资本形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则重点揭示了隐藏在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剥削和统治无产阶级的基础和依据。这些学说在对资本进行分析时，把重点都放在了生产关系及作为其核心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分配权等问题上。然而，以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为目标的美国学派对资本的研究则将目光聚焦于其生产性作用方面，资本并非仅仅是物化劳动，由燃料提供动力的、能量密集型的资本是人类可以更好地支配自然能量的生产体系。于是，资本设备工业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强调这一产业的发展也成为了美国在当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强有力论据。

如果把上述资本理论放到当代演化经济学的生态理论框架中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进行理解。生态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曾从生产而非分配的角度将生产要素重新区分为知识（know-how）、能量和物质三类。这里的知识指的是形成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信息结构，在人类社会就是指其发展所需的各种科学技术。信息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切生产都是知识利用能量和物质创造产品的过程。因此，劳动、资本和土地实际上是更为本质的知识、能量和物质三类要素以不同形式结合的产物；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划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传统学者一般更关注成果的分配而非产品的创造。<sup>⑥</sup>我们发现，史密斯显然不属于传统学者之列，他将资本视为激发自然生产力、增加社会能量剩余的手段，就意味着该意义上的资本不仅释放自身的能量，还承载知识并发挥引导和控制生产的作用，即人类用以资本为载体的知识来开发能量、改造物质从而实现生产。资本积累，无论在数量上表现为设备增加，还是在质量上表现为技术提高，本质上都是人类控制了更多或更好的知识技能，从而在生产中更为有效使用能量和物质的表现。

基于上述对资本的认识，美国学派进而提出，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生产性质上拥有共同的特征，即在提供类似的生产服务时，其贡献都可被还原为某种“工作作用力”（work effort，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能量）。如果以此为标准，则三种要素之间存在着竞争：资本可以创造劳动提供的能量产出，从而替代后者而作为原始工作的提供者；以化学肥料和农业机械形式存在的资本可以增加土地生产率，从而部分替代土地。这些学者发现，19世纪一些拥有丰富体力劳动资源和肥沃土地的国家，其工农产品却会由于价格过高而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国家所拥有的高质量资本和劳动排挤掉了落后国家未经改良的土地和缺乏技能的劳动。各国商品的国际竞争，本质上都是能量这一根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开发水平的竞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与资本—肥力密集型农业，与落后国家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肥力耗竭式农业展开竞争，前者拥有的国际贸易优势决定于其生产要素开发能量的绝对优势。史密斯指出，工业革命使英国的机器生产力已经提高到相当于6亿人口的力量，对机器的使用是英国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关键，因此一国通过不断拓宽工业技术的使用边界，可以在商品贸易中击败那些过度依靠工人体力和土壤肥力来提供能量的过时生产模式。<sup>⑦</sup>

生产要素交叉竞争的思想与倡导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及其衍生出的要素禀赋

理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和优势。首先,美国学派反对古典学派假定三种要素不存在竞争并发挥不同生产作用的观点,认为该观点只是把产业资本视为一种工具而机械地生产系统。正因为现实中各种要素存在竞争关系、可以相互替代,所以主流理论认为的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比,某种要素的密集度更高的看法就是不合适的。其次,由于国家间要素的生产率存在着绝对差异,不同国家关键性要素投入的成本—收入差别就不是相对的。这就是说,作为劳动或资本生产率较高的结果,一国的相对生产优势将变成其收益的绝对优势。因此,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将处于工农业生产的绝对领先地位,制造出超过本国需求的大量剩余产品并占领落后国家市场。再次,由于存在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将流向最具生产性的同时也是劳动和土地的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而并不青睐那些只拥有丰富的体力劳动或土地资源的落后国家。⑧

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并没有说明一国要素禀赋,尤其是丰富的资本供给最初如何形成。它认为资本稀缺的落后国家被赋予了劳动或者土地的比较优势,因此应继续在低端产品的生产中消耗体力劳动或土壤肥力。然而,美国学派穿透了自由贸易理论设置的重重迷雾,揭示了工业资本在开发能量方面的巨大作用,探究了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相互竞争的机制。以此为基础,为了帮助美国商品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美国学派提出了他们的保护主义国家政策,不断推进美国工业化的实现。19世纪后半叶,美国先是利用蒸汽机和电动机大量取代了工人体力劳动,而后又在使用人造化肥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方面获得了不断进步。

#### 四、高工资生产率理论与土壤肥力生产率理论

上述价值和资本理论充分论证了资本积累带来的工业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然而19世纪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与欧洲相比明显较高,欧洲和美国本土的自由贸易鼓吹者由此认为,人口稀少和工资较高证明了制造业的发展必然是高成本的,美国无法在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可是,美国学派提出了高工资生产率理论,用以说明高工资并非制造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史密斯曾指出,“高工资率是廉价生产的指标”,获得高工资的工人使每单位劳动的成本变得更为低廉,与欧洲的乞丐劳动力相比,拥有充足食物和良好教育的美国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劳动成果。⑨向工人支付高工资可以使其获得更为充足的体力和精力,获得操作更加精密设备所需的专业技能,从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生产率的提高将促使更多的资本设备投入生产,从而保证了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始终高于工资的上涨速度。由此可见,与英国古典理论“高利润与高工资不能共存”的论断不同,美国学派将工资视为劳动生产率的函数,而非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函数;同时,劳动生产率又决定于工人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专业素质,这近似于今天所说的人力资本。于是,与资本激发自然能量类似,只有人力资本更密集的工人才能投入到高级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自身生产力和自然的潜在能量。要获得必要的人力资本,较高的工资水平就必不可少,但同时权衡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两个方面就可以发现,与低工资低素质的劳动力相比,高工资的专业劳动力将在实际生产成本上获得明显的优势。正是依靠这种工资率—劳动生产率相互促进的关系,整个经济才能实现正反馈的良性循环。

应当看到,一国实行这种高工资战略实现工业化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劳动与高质量的资本相结合,使得劳动生产率超过工资成本,巨大的经济剩余才能被创造和分享;其次,完整统一的国内市场被建立,不依赖别国的工农产品合理流通,才能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需求和动力。因此,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美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核心论据,正在于这种政策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建立统一的国内工农业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对农业发展的分析中,美国学派将其着眼点放在了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壤肥力的问题上。19世纪前半叶,美国大规模出口少数几种农作物的贸易模式造成了土壤肥

力的严重损耗和大量废弃土地的出现。针对这一情况，凯里通过研究农业种植发展史和美国土壤化学理论，与其他学者共同提出了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动态观点：土地并不具有古典学派所谓的原始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其肥力是一种可以被耗尽的可变力量；土地是一种资本，一国农业产出是土壤肥力和土地面积的函数，而土壤肥力是人造资本投资的结果。因此，由于美国大量出口单一农产品所造成的土地资本损耗（即肥力的衰竭）并未反映在出口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中，这种隐含成本将最终摧毁农业未来和潜在的生产能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凯里和史密斯等学者认为，要使土地实现肥力提高和报酬递增，必须建立完整统一的工农产品国内市场，从而打破原有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国内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多种农作物合理轮种的模式被采用，有利于城市废弃物作为肥料回归土壤，有利于采用工业技术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和农业生产效率。于是，土地资本所拥有的自然能量将持续得到补偿、增加和更为有效地利用，对土壤肥力的合理使用最终将服从于报酬递增规律。城乡与工农业的平衡可以保持农产品价格并实现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合”，农业生产不再以满足出口需要为目的，国际市场对本国农业的控制才能被彻底终结。然而，要打破原有贸易模式，推进工农业的合理发展，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也就成为了必然的政策选择。美国学派由此也论证了保护主义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和谐，也能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利益和谐。

## 五、结论与启示

我们不难发现，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经济发展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资本生产性作用的重新认识：以资本积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改进劳动质量，从而影响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资本的核心作用是开发自然的潜在能量并以此实现对其他生产要素的竞争与替代；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的良性循环；土地资本的改进实现农业生产的报酬递增；总之，实现充分发挥资本作用的工业化是后发国家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原则和基本方法。根据上述理论，美国学派的学者们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现实情况出发对一国实现工业化的意义、条件和路径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为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国民银行与利益和谐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美国体系”<sup>⑩</sup>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当然，受到社会环境和阶级立场的限制，上述思想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将分析局限于国内层次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鼓吹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而纵容了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剧烈膨胀和垄断，宣扬阶级利益和谐却无视工人阶级逐渐贫困的趋势及根源，强调国家的对外经济作用但否定政府完善国内经济秩序的职能等。然而瑕不掩瑜，美国学派仍然可以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和启示。该学派认为，为了使能量剩余不断地增加，人们应当依靠以资本积累为载体的技术进步提高对劳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集约化的轨道。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粗放型生产模式，尤其是在深入参与现有国际分工之后，我国被人为限定于集中发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优势。于是为了出口需要，凭借工人低工资来获得成本优势的生产模式广泛扩展，本就并不丰富的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而真正发挥提高生产力作用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发展严重受阻，或者被外资所控制，这正是我国生产性投资逐渐减少、内需长期低迷、大量产业产能过剩、劳动者陷于低生产率—低工资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而要打破这一困局，我国应逐渐摆脱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并在美元霸权支配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立足于保护民族产业，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和完善国内市场，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提高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从而促进本国资本的生产性积累。这

也正是美国学派根据要素的生产性作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同时，美国学派的工农业发展理论向我们充分证实了，只有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才适合发展中的大国。因此我国应当提高保护本国切身经济利益的意识，逐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根本战略转型，保护民族产业、国内市场以及本国的资源环境，促进劳动者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良性互动，在本国范围内形成高技术产业、低端制造业和农业相互提供市场的格局，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注释：

①亨利·凯里曾担任林肯总统的经济顾问，帕申·史密斯担任过作为林肯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国务卿的威廉·苏厄德的经济顾问，以及明治维新后美国驻日本顾问。

②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25-230页，第233-2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页。

④孟捷：《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⑤Smith, E. P.,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 P. Putnam &son, 1853, p63-71.

⑥Boulding, K. 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1, pp. 24-27.

⑦Smith, E P.,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 P. Putnam &son, 1853, p. 53.

⑧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9-330页。

⑨Smith, E. P.,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 P. Putnam &son, 1853, p. 104.

⑩贾根良：《美国学派：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